

Erich Maria Remarque

〔德〕雷马克 著

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

朱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文学经典



Erich Maria Remarque

〔德〕雷马克 著 朱雯 译

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旋门 / (德) 雷马克(Remarque, E. M.)著;朱雯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7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
ISBN 978-7-5327-6972-8

I. ①凯… II. ①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5177 号

Erich Maria Remarque
ARC DE TRIOMPHE

图字: 09-2004-393 号

凯旋门

[德] 雷马克 著 朱雯 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12,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72-8/I·4220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51-5859480

译本序

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祖先是法国人,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时迁移到了莱茵兰。家境清贫,父亲在当地普雷勒工厂当书籍装订工人。他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雷马克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天主教会学校念书。在当时,穷苦人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是教书,因为进师范学校学习不需要家长在经济上有什么负担;就这样,从1912年起,雷马克读了天主教会办的师范预备班,1915年正式进入当地的初等师范学校,可是修业未及两年,1916年11月就从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五次负伤,特别是最后一次在佛兰德战役中,他从火线救出一位受伤的战友时,在英军的突然袭击下,自己被好几颗手榴弹所炸伤,伤势相当严重,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总算只在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退的瘢痕。大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原来的学校,修毕规定的课程,在靠近荷兰边境的一个村子里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但是他对这个工作有点失望,觉得太受约束,而且根据他自身的经验,教书也不过是为国家培养新一代的士兵,因此就坚决辞去了教职。二十年代,对战后德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自己说是“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我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我又做过石匠,干过其他一些事情,还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当过风琴手”。之后,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1922年秋,去汉诺威大陆公司正式担任广告部主任兼《大陆回声报》主编,为这个刊物写了许多作为轮胎、摩托车、汽车广告的短小而幽默的文字。由于撰写这类文字所显示的才能,他被聘任担任《体育画报》的编辑,于1925年移居柏林。在这个刊物上,他曾连载过一篇题名为《地平线上的车站》(Station am Horizont)

的小说，反映了他对汽车和赛车的爱好，但是也像 1920 年在德累斯顿自费出版的另一本小说《梦之窝》(Die Traumbude)一样，写得“实在很糟”。后来他自己也说：“早些时候，我完全不是这样写作的。我做过种种试验……为了想创立一种风格，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显得沉闷而苍白，自己一点也不满意，大概因为我的路子完全走错了。”

1927 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他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手稿却在抽屉里搁置了半年。一家书店不愿意出版这部作品，一家出版社总算接受了下来，先在《福斯报》上连载，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连载的时候，那份报纸的销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人们都说十九世纪英国读者争先抢购狄更斯连载小说的盛况，居然重见于今日的德国。1929 年 1 月全书出版后，更引起了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轰动。仅在德国国内，第一年就销售了一百二十万册。同年 3 月，首先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每册定价虽高达七先令六便士，但六周之内销售了二十七万五千册，把其他许多语种的译本一并计算在内，此书总发行量当在五百万册以上，这在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意外的成功，使雷马克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剧变：原先是个无名小卒的记者，竟然一跃而成为闻名世界的作家。有人喜欢他，有人厌恶他，有人称颂他，也有人诋毁他，一时间对他本人和这部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一向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既不愿意接见为此而来访的客人，更不愿意参与有关他作品的争论，况且他从来都以不问世事自居。他也确实从来不参加任何社会运动，不料到了 1930 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采取反对英雄主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在军事冲突中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正是锤炼国家社会主义的钢铁精神的熊熊烈火，因此他们决不能宽恕他对这个纳粹神话的挑战。正好那时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拍摄的美国影片准备在柏林放映，区的纳粹党

魁戈培尔便利用这一时机，唆使一帮希特勒青年团员向那家剧场进行破坏和捣乱，达到了禁演这部影片的目的。这一行动，迫使雷马克不得不离开柏林，甚至不得不离开德国。他后来说：“1931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离开柏林以后，他到了瑞士，定居于马乔列湖上的龙谷港，纳粹政变的消息他就是在那里听到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开烧毁，随后又因为他坚决拒绝回国而于1938年被褫夺了德国国籍。翌年，他转赴美国，到1942年为止，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194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雷马克虽然已经流亡国外，但是纳粹政权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1943年12月，他那仍在德国的妹妹埃尔夫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诬控她不相信德国会取得胜利）被纳粹法庭宣判了死刑。从1945年起，雷马克也常在瑞士居住。六十年代中期，他突发过多次心脏病，健康状况因此而每况愈下，1970年9月25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终年72岁。

雷马克一生写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剧本《最后一站》（Die letzte Station, 1956年）。十一部小说中，除《西线无战事》专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其余几部按题材来划分，有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通货膨胀年代生活的，如《战后》（Der Weg zurück, 1931年）、《三个战友》（Drei Kameraden, 1937年）、《黑色方尖碑》（Der schwarze Obelisk, 1956年）、《上帝没有宠儿》（Der Himmel kennt keine Günstlinge, 1961年）；有写流亡生活的，如《爱你的邻人》（Leibe deinen Nächsten, 1953年）、《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1946年）、《里斯本之夜》（Die Nacht von Lissabon, 1963年）；有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如《生命的火花》（Der Funke Leben, 1952年）、《生死存亡的年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 1954年）。作家逝世后一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天堂里的

影子》(Die Schatten im Paradies, 1971年)问世。

雷马克写流亡生活的几部作品中,数《凯旋门》最有影响;除《西线无战事》以外的十部小说中,也数《凯旋门》最为畅销。在德文原著发行之前,它的英译本首先在美国出版,仅在美国国内,销数就在二百万册以上,不久被译成十五种文字,又销售了五百万册,其盛况与当年《西线无战事》不相上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情节十分动人,艺术手法也更臻成熟。依我个人看来,《西线无战事》只能说是雷马克的成名作,《凯旋门》才是他的代表作。

小说主人公拉维克(直到小说结尾,读者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路特维希·弗雷森布格),原来在德国一家大医院里当外科主任医生,受纳粹秘密警察迫害和追捕,两年前流亡到法国,在巴黎为一位医术并不高明的法国医生维伯尔和另一位上了年纪的时髦医生杜兰特充当“捉刀的”外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他在塞纳河上的一座桥畔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琼·玛陀,从而演出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喜剧。有一次,他在街头抢救一位在事故中受伤的女人,因为没有身份证件而被法国警察拘捕,并驱逐出境,到了瑞士。几个月后他潜返巴黎,琼却已经跟一个演员住在一起,出于嫉妒,那演员向琼开了一枪,子弹打在她的颈椎里,不容易取出来。拉维克虽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对此却无能为力。在琼和拉维克相互诀别,并明确表示彼此相爱以后,拉维克给琼注射了解除痛苦的最后一针,从而结束了她无法挽救的生命。

与这个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复仇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拉维克于1933年在德国,曾经帮助两个朋友逃出了纳粹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和他的女友茜贝尔却被一个名叫哈克的秘密警察头目抓去审问,并施以种种酷刑。拉维克被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好不容易从集中营的医院里逃出来。到了巴黎,拉维克又偶然碰上了哈克,这就燃起了他的复仇之火。因为没有被认出来,拉维克便佯装跟他交上了朋友,并带他去冶游作乐。几星期后,拉维克终于找到了复仇机会。他把哈克哄进一座

树林，谎称那里有一家高级的幽会场所，可以找上流社会妇女来作乐。就在去树林的路上，他用活动扳手猛一下把哈克给打死了。

跟雷马克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凯旋门》的时代背景展示得特别清晰。小说开头后不久，就写到“探照灯安装在凯旋门后面。它们照亮着无名英雄墓。一面巨大的蓝、白、红三色旗，在墓前迎风飘扬。这是1918年停战的二十周年纪念”。很明显，这一天是1938年11月11日。在小说的结尾，又写到“维伯尔指着一张晨报的号外。德军进占波兰。‘我从政府方面得到消息。今天就要宣战了’”。法国向德国正式宣战，那是在1939年9月3日。所以小说女主人公琼在临死前对拉维克说：“从那个时候起——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不再知道该往哪儿去——是你给我的——这一年。这是时间的礼物。”在这一年里，欧洲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小说都有所反映或间接提到。拉维克有个富有的女病人凯特·赫格斯特龙，就谈起过她的前夫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如今已变成一名摇旗呐喊的纳粹冲锋队头目。这很可能发生在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军队侵占奥地利的前后。小说又多次提到并谴责慕尼黑协定。那是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于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会议时签订的。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和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则由英、法、德、意共同“保证”不再受侵犯。捷克政府在德国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绥靖政策的诱骗下，接受了这个条件。同年10月、11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不料于1939年3月15日德国违反协定，又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领土；9月1日，甚至还进攻波兰。至此，英、法才不得不对德国宣战。几天之内，所有居留在法国的德国人，都被逮捕，并给关进了拘留营，这中间就有小说主人公拉维克医生。

作为一个没有护照、没有任何证件的难民，拉维克在巴黎过的流亡生活是很不好受的。他无法租用公寓房间，只能借住在一家挤满了犹太

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难民的旅馆内。他日夜担心着法国警察的搜查和拘捕。一旦被发现，他就要被押送出境。有一回他曾被驱逐到捷克，与他所爱的琼别离，从而酿成了一出爱情悲剧。但和其他许多流亡在法国的难民相比，他的生活应当说是稳定的。他从未遭受过冻馁的威胁。虽然作为一个医术高明的“捉刀”医生，他受到两位法国同行的剥削是不难想象的，可他毕竟还能过相当优裕的生活，可以和琼一起去度假胜地里维耶拉谈情说爱，演出一幕迥非一般难民所能搬演的爱情剧。所以说，拉维克的痛苦，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而除了一般难民所共有的精神痛苦以外，他还有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痛苦。那就是他对几年前在德国集中营里折磨过他、折磨过他的女友的秘密警察头目哈克怀有深仇大恨，惨痛的往事时刻啃噬着他的心，使他一直无法平静。后来看见哈克出现在巴黎，他又伺机追踪，一心想猎获这头嗜血的野兽，结果，终于把这个杀人的魔王消灭了。而同时，他对萍水相逢、桥畔邂逅的琼·玛陀则怀着挚爱深情。拉维克原先对人生抱有一种消极、冷漠的态度，有点玩世不恭，自从与琼相识又相爱以后，他的态度改变了，精神振作起来，生活有了勇气，有了信心，正像他一再跟琼说的，“你使我活着，琼。你使我活着。我本来只是一块顽石，是你使我活着的”；“没有了你，我便什么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的苦涩——你震撼了我，你给了我你自己和我自己。你使我活着”。正因为爱得真挚，爱得热烈，他就一直担忧着会失去她，而事实上，一次生离，一次死别，结果还是失去了。杀死哈克和失去了琼，使他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内心的宁静。作者在小说结尾，以洋溢着诗意的笔触，描绘了拉维克最后离开巴黎时的心态：

“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经过去的和仍然会到来的，这就够了。即使是结局，这样也很好。他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已经失去了她；他曾经恨过一个人，已经杀死了他：这两件事情，都使他解脱了。一个人复活了他的感情，另一个人消灭了他的过去。没有一件未了的尘缘。没有欲

望；没有憎恨，也没有哀怨。”

琼是雷马克笔下最有个性的一位女性形象，琼和拉维克的瓜葛是最富魅力的一个爱情故事。作者素以善写对话著称，而琼与拉维克的对话，更是一件最为感人的艺术珍品。尤其是他们在琼临终前的那一段，各人用各人儿时的语言，琼用意大利语，拉维克用德语，表达了各人满腔的积愆，虽然互不通晓，却进行了最为深邃的心灵交流，读者掩卷寻思，恐怕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激动。

关于琼·玛陀这个人物的原型，评论界颇多揣测，有人认为很可能是雷马克的好友，好莱坞的著名影星玛琳·黛德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们俩正好一起生活在巴黎。小说一开头，对琼就有这样几句肖像描写：“只见她脸色苍白，颧骨高耸，两只眼睛间距很宽，容颜呆板，活像一张假面具”；“她那张苍白的脸上，差不多毫无表情。嘴很饱满，就是没有血色，看上去轮廓显得模糊；唯有头发可长得挺美——一种有光泽的、天然的金黄秀发。”这又正好是玛琳·黛德丽的写照。至于拉维克这个人物，很多评论家认为他的原型就是雷马克自己，因为拉维克的处世态度完全体现了雷马克的人生哲学。雷马克自称是一个“不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他忠于“高尚的个人主义”，视“最普通的人道法则”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拉维克正是这些思想的化身。国际旅馆中有一个名叫莫罗佐夫的难民，“是第一次大战的流亡者，近十五年来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样一种俄国人，他们不谈自己曾在沙皇的禁卫军里服过役，也不提自己那贵族的门第”，很明显，他这个“流亡者”与受纳粹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巴黎的难民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而拉维克却引为最相投合的知己，雷马克也在小说中把他作为一个仅次于拉维克的重要人物。再说拉维克的杀死哈克，固然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具体行动，但从动机到手段，都属于私人复仇的性质，与当时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反纳粹德国的任何组织完全没有联系。雷马克是拉维克的原型，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承认，不过拉维克是个医生，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子。雷马克有一次在会见布拉格一位记者时说：“拉维克这一形象，包含着三个人的特征。我自己，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两位医生，他们也像我一样，隐姓埋名住在巴黎。其中一位，我在心脏病第一次发作时请他来看过病……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学过医学，小说中有关医学方面的内容是他帮助我写下的。”

《凯旋门》是我翻译雷马克的第一部作品。1945年秋天，这部小说的英译稿首先在美国《柯里尔》周刊上发表，我当时就根据连载稿逐期翻译，逐日发表在上海一家报纸上，自1946年1月20日起至5月7日为止，连载了七十七天，还未刊完，就看到由美国D·阿普尔顿—世纪公司出版的英译本，才发现连载稿原来只是原著的节译本，于是又根据全译本重译了一遍，于1948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在当时初版后记中写道：“在出版方面，我应该特别感谢李先生。假如没有他对于原著的卓越的鉴赏，以及对译者的友善的鼓励，我还不相信，在物价腾贵的今日，能使这样一个拙劣的译本得到出版的机会。”巴金先生不仅把《凯旋门》列入他主编的“译文丛书”，而且还希望我把雷马克的所有作品一一介绍过来，汇编成《雷马克全集》。感谢他的鼓励，我后来又翻译了雷马克的几部作品，但由于疏懒，我并没有完成他的期望和我的心愿。我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看来已不大可能了却这桩心愿的了，因此对四十多年前翻译的这本《凯旋门》，特别有一种说不分明的情感。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让我有一个重排译文的机会，使我下决心根据原著重译，可由于近年来衰病侵寻，不能连续持久地工作，竟又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即便如此，仍难免有疏漏纰谬之处，于心深感不安，在此敬请方家和读者们匡正。

朱 雯

1994年6月于病中

一个女人转过身朝拉维克走过来。她走得挺快，可是脚步蹒跚得古怪，直到她差不多挨近他身边的时候，拉维克才发觉她。只见她脸色苍白，颧骨高耸，两只眼睛间距很宽，颜容呆板，活像一张假面具；看样子仿佛凹陷下去似的，而一双眼睛，在街灯的亮光里，显出一种没有神采的空虚的表情，这便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女人那么紧挨着他身边走过去，差点儿跟他碰着了。他便伸出一只手去，抓住她的手臂；她身子一晃，要是他不去扶住，她准会倒下去。

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臂。“您要去哪儿？”过了半晌他问。

那女人呆望着他。“放开我！”她轻轻地说。

拉维克没有回答。他还是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臂。

“放开我！你这是想干什么？”那女人勉强动了动嘴唇。

拉维克有着这么个印象：她根本没有瞅他。她只是透过他，望着茫茫黑夜的一个什么地方。他只是一件什么东西，把她挡住了，她就跟这东西讲着话。“放开我！”

拉维克马上看出来，她不是一个妓女。她也没有喝醉酒。这会儿，他把她的手臂抓得不那么紧了。她若要挣脱，那是很容易的，可是她没有转到这个念头上。拉维克等了一会。“夜里，单身一个人，在这个时辰的巴黎，您到底想去哪儿呢？”他心平气和地又问了一句，把她的手臂松开了。

那女人还是不吭声。不过她也没有再往前走。仿佛一旦停了下来，她就再也不能继续动弹似的。

拉维克倚在桥栏杆上。他可以感觉到手底下那潮湿而多孔的石块。“也许是到那儿下面去吧？”他往后边转过头，朝下面塞纳河指点

着，在那灰茫茫的、正在逐渐消逝的光辉中，这塞纳河奔腾不息地向着阿尔玛桥的阴影流去。

那女人没有回答。

“太早了，”拉维克说。“太早了，十一月的天气，冷得太厉害了。”

他掏出一包纸烟，又在衣袋里摸索着火柴。他发现那小纸盒里只剩下了两根火柴，于是便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去，用双手遮住火焰，免得让河上飘来的微风吹灭。

“也给我一支烟吧，”那女人用一种几乎听不清楚的嗓音说。

拉维克抬起头，把一包纸烟递给她。“阿尔及利亚的。外国军团的黑烟草。对您来说，也许太凶了一点。别的纸烟，我这儿可没有。”

那女人摇了摇头，取了一支。拉维克把燃着的火柴递给她。她抽得很急，吸得很猛。拉维克把火柴梗往栏杆外扔去。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流星，穿过黑暗往下掉落，直到触及水面，它才熄灭。

一辆出租汽车慢慢地驶过石桥。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他朝他们望了一眼，等了一会，随后一踩油门，沿着湿漉漉、黑沉沉的乔治五世路驰去了。

拉维克突然觉得很累。他工作了一整天，却还睡不着觉。因此他又走出来喝酒。可是这会儿，在阴冷的深夜，疲劳突然像个袋子一般把他没头没脑地笼罩起来了。

他瞅着那个女人。他干吗要拦住她呢？她总有那么点儿不对劲，这是很明显的。可是，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呢？像这种有点儿不对劲的女人，他已见识得多了，特别是在深夜，尤其是在巴黎，而现在，对他来说这本来也无所谓，他所需要的只是几小时的睡眠。

“回家去吧，”他说。“深更半夜的，您还在街上干什么？您只会招来麻烦。”

他把大衣领子翻了起来，准备走开。那女人却瞅着他，好像不理解

似的。“回家？”她重复了一遍。

拉维克耸了耸肩膀。“回家，回到您的公寓里，回到您的旅馆里，回到您爱叫什么就叫什么的地方去。您总不会愿意让警察给抓去吧？”

“回到旅馆去！我的天！”那女人说。

拉维克停住了。又是一个自己不知道该上哪儿去的人，他想。这是他事先能够料到的。情况往往总是这样。晚上，她们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可是第二天清早，你还没有醒来，她们却早就走掉了。那时候，她们倒知道该上哪儿去啦。这种陈旧的、廉价的悲观绝望，是跟黑暗一块儿到来，又跟黑暗一块儿离去的。他把烟头扔了。倒像他自个儿不明白这种情况，又像他明白得到了厌烦的程度！

“来吧，让我们上哪儿去喝一杯。”他说。

这是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到那时，他可以付了账就走，而她也可以决定怎么行事了。

那女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脚下绊了一下。拉维克一把抓住她的手臂。“累了么？”他问。

“我不知道。我想可以。”

“太累了，反而睡不着么？”

她点点头。

“那是会的。来吧。我来扶着您。”

他们走到马索林荫道。拉维克感到那个女人紧靠着他。她靠着他，不像是疲累了的样子，而像是快要摔倒下来，非得撑住不可似的。

他们穿过赛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在夏洛特街的交叉口后面，有一条街伸展着，远处，轻飘飘、黑沉沉地，凯旋门那个庞然大物像是浮现在细雨迷蒙的天空中。

拉维克指着一家地下室酒店那狭窄的、亮着灯光的门。“在这儿——咱们还能搞到一点东西吃咧。”

这是一家汽车司机们常去的小酒店。这会儿，有几个出租汽车司机和两个妓女坐在里面。司机在玩纸牌。两个妓女在喝苦艾酒。她们飞快地瞥了一眼，打量着进来的女人。随后她们不感兴趣地把脸转开了。年岁较大的那一个，大声地打了个哈欠；另外一个没精打采地动手在脸上化妆。背后，有个勤杂工，长着一张疲乏的耗子似的脸，把锯屑撒在四周，随后开始打扫地板。拉维克和那个女人，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坐下。这儿比较方便；他更容易离开。他大衣也没有脱。“您想喝点儿什么？”他问。

“我说不上。随便什么都行。”

“两杯苹果白兰地，”拉维克跟一个穿着背心、卷起衬衫袖子的招待说。“还要一包吉士牌香烟。”

“这牌子的我们没有，”招待说。“只有法国烟。”

“那也好，就来一包劳伦斯绿包的。”

“绿包的我们也没有。只有蓝包的。”

拉维克瞧着那个招待的胳膊，那上面刺着一个在云端里行走的裸体女人。随着他的视线，那招待攥紧拳头，让肌肉跳了起来。于是那个云端里的女人，便淫荡地扭动着她的肚子。

“好吧，就要蓝包的，”拉维克说。

那招待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说不定我们还有一包绿包的留着呢。”他拖着脚步走了。

拉维克的视线一直盯着他。“他脚上穿的是红拖鞋，”他说，“胳膊上刺的是一个印度舞女！他一定在土耳其海军里服过役。”

那女人把一双手搁在桌子上。她搁下去的样子，倒像她永远不想再把它们抬起来似的。她这双手曾经细心保养过，但这并不说明什么。它们仍然没有保养得怎么好。拉维克发现，她右手中指的指甲都已经裂开；好像撕裂以后没有锉齐；有些地方，指甲油都已经剥落了。

招待送来了两杯酒和一包烟。

“劳伦斯绿包的。总算找到了一包。”

“我想您是会找到的。您在海军里服过役吗？”

“不。在马戏团。”

“那就更好。”拉维克把一杯酒递给那个女人。“这儿，您喝。在这种时刻，这是最好的东西了。也许，您还想来点儿咖啡？”

“不。”

“那就把这杯酒一口气喝干了。”

那女人点了点头，把酒喝干。拉维克打量着她。她那张苍白的脸上，差不多毫无表情。嘴很饱满，就是没有血色，看上去轮廓显得模糊；唯有头发长得可挺美——一种有光泽的、天然的金黄秀发。她戴着一顶扁圆形的无檐帽，雨衣里面穿一套定制的蓝色连衫裙。这套衣服是由一位手艺高强的裁缝制作的，不过她手上的那只绿宝石戒指，因为宝石太大，反而不像是真的了。

“您还想来一杯吗？”拉维克问。

她点点头。

他招呼招待。“再来两杯苹果白兰地。不过杯子要更大一点的。”

“更大一点的杯子？里边的酒也要更多一点吗？”

“是的。”

“那就是两杯双份的苹果白兰地了。”

“你猜得很对。”

拉维克决定赶快喝完就走。他既感到厌烦，又累得要死。一般来说，他对待这些意外事情原是很有耐心的；他已经经历了四十多年风云变幻的生活。不过像此刻这样的局面，他也见识得太多了。他在巴黎住了好多年，晚上往往睡得很少——于是在路上看到的就多了。

招待把两杯酒送来了。拉维克端起一杯酒味强烈、香气沁人的苹果白兰地，小心翼翼地放到那个女人面前。“这一杯您也喝了吧。它不会起多大作用，可是能让您暖和暖和。再说，事情不管怎么样——您别

把它看得太严重。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会长久严重下去的。”

女人瞅着他。她没有喝酒。

“的确是这样，”拉维克说。“尤其在夜里。黑夜把一切都夸大了。”

那女人仍然瞅着他。“您用不着安慰我，”她说。

“那就更好啦。”

拉维克环顾四周，找那个招待。他已经够了。他知道这种类型的人。她大概是俄国人吧，他想。她们这种人啊，只要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身上还是湿漉漉的，可就变得放肆起来了。

“您是俄国人吗？”他问。

“不是。”

拉维克付了账，站起身来告辞。就在这同一瞬间，那个女人也站了起来。她这个动作又沉静又自然。拉维克迟疑地望着她。好吧，他随后想，到了外面我也一样可以脱身的。

天已经在下雨了。拉维克立定在门口。

“您往哪个方向走？”他决定跟她走相反的方向。

“我不知道。哪儿都行。”

“可是——您住在哪儿呢？”

那女人做出一个急速的动作。“我不能到那儿去！不，不能！我不能那么做！不能到那儿去！”

她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一种狂暴的恐惧。她吵过架，拉维克想。跟谁闹了一场，她就跑到外面来了。明天中午，她会重新考虑一番，回到家里去的。

“您认识什么人可以上她那里去的吗？相熟的人？您不妨从小酒店里给他们打个电话去。”

“不。一个也没有。”

“可您总得上一个地方去。那您没有钱去开一个房间吗？”